



价格理论与实践

Price: Theory & Practice

ISSN 1003-3971, CN 11-1010/F

《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新质生产力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与展望
作者: 邱霞, 原磊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1.006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2-27
引用格式: 邱霞, 原磊. 新质生产力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与展望[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https://doi.org/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1.006>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新质生产力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与展望

邱霞 原磊

内容提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研究新质生产力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将通过技术红利、结构红利、制度红利、绿色红利四个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未来十几年，在四个红利支撑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望保持较快增速，但实际增速将受到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为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从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新要素培育、因地制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四个方面着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技术红利；结构红利；制度红利；绿色红利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1.006

2024年，中国经济在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下，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GDP实现5%的增长，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目标，从全球来看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为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从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根本抓手，必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征事实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等所有能够改变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都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理论界大部分研究认为，尽管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推动因素，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蔡跃洲等（2017）认为，1978-201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3.8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4%。刘世锦等（2015）研究认为，1978-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我国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比较典型的就是伍晓鹰（2013），认为1980-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0.5%，远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研究结论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测算的方式不同，核算覆盖面越广、核算越精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越小。同时，通过进口高技术投资品和中间投入所带动的技术进步，在增长核算中会被归为要素的增长，而不会归为全要素生产率。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基本符合发展

①②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2024-02-0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口述历史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BDJ065）。

作者简介：邱霞（1979-），女，汉族，山东青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原磊（1980-），男，汉族，山东威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发展。

阶段特征

据格罗宁根大学测算结果,2000-2010 年我国全要素增长率平均增速为 2.31%,而 2011-2019 年为 -0.72%,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同期水平相近。2000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959.36 美元,2010 年为 4550.47 美元,2019 年为 10143.86 美元。与我国发展阶段相对应,日本 1965 年人均 GDP 为 928.52 美元,1973 年为 4,061.01 美元,1983 年为 10,583.13 美元。1965-1973 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 0.11%,低于我国 2.2 个百分点;1974-1983 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 -0.61%,与我国基本持平。韩国 1977 年人均 GDP 为 1055.88 美元,1988 年为 4748.64 美元,1994 年为 10385 美元。1977-1988 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 1.84%,比我国低 0.47 个百分点;1989-1994 年,平均增速为 1.08%,比我国高 1.8 个百分点。

(三)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明显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相比于 2000-2010 年,2011-2019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了 3 个百分点。造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本国企业、资本和人才的政治约束和政治驯化,给全球资本、技术、服务流动造成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大范围接受国际技术援助的可能性下降,技术引进和创新变得更加困难,技术进步速度受到影响。

表 1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单位:%)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2000 年	0.91%	2011 年	-0.01%
2001 年	1.05%	2012 年	-3.09%
2002 年	3.37%	2013 年	1.46%
2003 年	0.91%	2014 年	1.45%
2004 年	2.35%	2015 年	-0.93%
2005 年	2.41%	2016 年	-0.40%
2006 年	4.72%	2017 年	-1.43%
2007 年	4.91%	2018 年	-3.29%
2008 年	0.59%	2019 年	-0.26%
2009 年	1.21%	平均	-0.72%
2010 年	3.02%		
平均	2.31%		

数据来源:格罗宁根大学

总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仅带动了经济规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改善。放眼全球众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变化,总体上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中国同样如此。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人均 GDP 相

近的历史阶段相比,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表现并不逊色。然而,近年来受到全球经济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处于放缓趋势,而这恰恰说明,我国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四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①。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具体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四个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一)技术红利

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是指既定投入条件下的产出增加,体现为生产前沿的移动。生产前沿表示对应每一种投入水平的最大产出,因此反映了某一行业的当前技术水平(金钰,2010)。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可以体现在生产环节,也可以体现在运营环节,还可以体现在管理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将大大提升我国企业效率,从而带动整体效率的提升。一是通过大数据决策的广泛应用,提高管理效能,降低运营成本。大数据决策实质上是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替代管理者的程序化决策,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二是推出更高质量、更优性能或者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接近 30%,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然而,“中国制造”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知名品牌较少等问题。采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能够提高我国企业生产水平和制造工艺,促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从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推出更高质量、更优性能或者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虽然并不一定会带来产量或销量的大幅增长,但会推动企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延伸,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而这也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升。三是推动业务流程再造,改进生产工艺,改造生产线,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进行重组整合,从而更好适应市

①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

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四是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得到应用。设备更新不仅是简单的机器替换,而且包含技术进步的更新过程,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蕴含于设备更新当中。202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①,这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 结构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成为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力量(刘世锦等,2015)。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的演变,这种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要素流动模式已逐渐失去可持续性,传统的结构红利正趋于耗尽。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迎来了新型结构红利的重大发展机遇,主要表现为所从事经济活动质量的持续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改进。Reinert (1999) 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两类:高质量经济活动与低质量经济活动。高质量经济活动具备显著的学习曲线、产出呈现高增长态势、技术进步迅速、依赖并促进经验学习、处于不完全动态竞争状态、工资水平较高、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潜力等特征。相比之下,低质量经济活动则学习曲线较为平缓,产出增长缓慢,技术进步缓慢,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工资水平较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潜力有限。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不同,中低收入国家倾向于从事低质量经济活动,而高收入国家则更多地从事高质量经济活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促进生产要素从低质量经济活动向高质量经济活动转移,而这也必然催生一些新型生产要素,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也是在过去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基本完成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

(三) 制度红利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目前,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也大大制约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Hsieh 等(2009)将劳动和资本价格扭曲因素引入到传统的垄断竞争模型中,用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收益的方差度量要素配置效率,将中国、印度

与美国进行比较,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资源配置效率水平达到美国水平,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到50%,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40%到60%。这说明我国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提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巨大潜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生产关系的全面改革,进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优化,并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具体来看,新型生产关系能够有效激发科技创新的先导效应,催生新兴产业、创新模式以及新的增长动力,进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首先,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新分工的不断涌现,一系列具有规模效应的新产业得以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的可能性,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其次,促进了新模式的发展。在新技术条件下,新要素的有机组合重构了生产环节和管理组织架构,形成了新的生产模式(原磊和张弛,2024)。新型生产关系不仅包括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还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机制和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有助于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绿色生产、工业互联网生产等新模式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最后,促进了新动能的形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新动能的形成关键在于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包括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采用新生产方法、形成新组织、获取新供应来源等。

(四) 绿色红利

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正推动全球生产力快速向绿色化发展路径转化,从而为经济发展塑造强劲动能。Michael E. Porter (1991) 提出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短期来看国家实施严苛的环保法规可能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从而削弱产业市场竞争力。但长期来看,恰当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创新、引导采用更优生产方式、生产污染较少或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产品,反而有助于推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Michael E. Porter 等(1995)又进一步分析了“波特假说”的背后机理,认为竞争优势并非建立在静态效率之上,而是建立在能够突破约束条件进行创新和改进的动态效率之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并非那些成本最低或规模最大的公司,而是那些有能力不断改进和不断创新的公司。很多学者(沈能和刘凤朝,2012)通过实证研究,对“波特假说”进行验证,总体结论是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①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4〕7号[EB/OL]. (2024-03-1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39233.htm.

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绿色生产力,这实际上准确把握了环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统筹推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一方面,通过绿色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更好实现绿色发展,更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绿色红利,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过程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化改造,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更好符合发达国家市场绿色环保标准,进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当前,我国企业的绿色化改造具有很大空间。通过采用绿色制造技术,能够在制造流程中实现对环境负荷的最小化,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及能源使用效能。这不仅有助于降低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助力企业构建更为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二是绿色产业自身的发展将催生新产业的形成,这些新产业往往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有助于提升整体生产效率。根据《“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到2025年,我国绿色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11万亿元,这进一步说明绿色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生产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我国大力提升绿色环保装备、新能源装备及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布局并精心谋划氢能、储能、生物制造、碳捕集及碳封存等面向未来能源与制造领域的新兴产业,推动国家绿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景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巨大空间。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达到美国60%之前,通常能够维持较高增长速度,但在超过之后增速可能会放缓。例如,采用格罗宁根大学数据计算,1969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首次达到美国60%以上,以此为分界,1955-1969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3.38%^①,而1970-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0.44%,下降86.98%;1991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首次达到美国60%以上,以此为分界,1973-1991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2.11%^②,而1992-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1.04%,下降50.71%。2019年我国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3%,大概与1955年的日本和1973年的韩国相当,那么从发展阶段来看,未来十几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可以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具体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除了发展阶段以外,还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一是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愈加复杂严峻,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强化,政治正确和国家干预对跨国企业生产经营和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个别国家将越来越寄希望于调整国际规则和利用国家权力获取收益,导致国家间经济竞争力演进的重点进一步从企业上移到国家层面,资源配置权不断上移,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西方国家采取“小院高墙”对我国科技发展进行围堵打压,导致我国“卡脖子”技术问题突出,也造成我国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难度加大。国际形势变化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下一阶段,国际形势的变化将继续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二是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的推动。卡萝塔·佩蕾丝(2007)认为,历次技术革命都要经历爆发阶段(技术的时代)、狂热阶段(金融的时代)、协同阶段(生产的时代)和成熟阶段(质疑自满情绪的时代)四个主要阶段。当前全球正处于新技术革命的爆发阶段,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开始进入相关领域,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处于不断探索当中,新技术新模式尚未对传统生产方式形成全面替代。正如信息革命爆发以后,经历了较长时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IT相关设备的价格下降加速,企业进行大规模的IT投资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才得到较大幅度提升(Dale W. Jorgenson等,2007)。相比于20世纪,当前全球科技传播和经济活动已大大加快,叠加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极大推动了新技术革命的进程。下一阶段,新技术革命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新技术新产业领域,将直接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三是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驱动。体制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就是中央不

^①1955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美国的42.15%,1969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美国的62.15%。

^②1973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美国的39.60%,1991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美国的61.42%。

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生产力的结果。然而,我国经济体制中还存在诸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既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微观主体环节,也涉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等运行机制,还涉及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领域,改革的涉及面广,困难挑战多、风险大。为此,必须统筹好发展、安全、稳定的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一阶段,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红利的释放,从而影响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四是受总需求变化的潜在扰动。总需求变化影响产能利用、人员就业等,进而影响国家整体产出水平。因此,在核算中也会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具体来看,如果总需求处于扩张期间,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发挥促进作用;反之,则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造成抑制。可以预计的是,未来五到十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总体处于稳定下滑趋势^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市场需求总体趋紧,虽然加强经济内循环能够部分抵消外需下滑的影响,但至多只能是部分消除,尤其是一些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从国内来看,内需不足尤其消费疲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这些都说明我国总需求面临较大压力,从而会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既面临着有利条件,也面临着现实挑战。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打破国外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打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从而推动科技革命进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既包括庞大的消费品市场,也包括丰富的新技术应用场景,从而促进总需求的扩大。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建议可从四个方面重点发力。

1. 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增强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前沿研究的资助力度,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领域,优化对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长期稳定支持体系,激励开展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时,推动企业创新研发模

式,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联盟,打造开放型创新平台,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能。

2.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工业体系以其完整性与规模之大而著称,不仅展现出强大的生产实力,而且具备完善的配套能力。我国拥有一个由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总计1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原磊和张弛,2024)。应致力于消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障碍和难点,加强区域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素顺畅流动。同时,推动形成健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3. 加强新要素培育。加快构建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积极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面向未来的新型人才。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探索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优化数据开发利用的新型体制机制,发挥数据作为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的作用。

4. 因地制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全局规划,避免盲目跟风及泡沫化现象的产生。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要求各地依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有选择性地推进新兴产业、创新模式和新动能的发展,并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升。

参考文献:

- [1]蔡跃洲,付一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宏观和产业数据的测算及分解[J].经济研究,2017,52(01):72-88.
- [2]金钰.公共部门规模、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0.
- [3]刘世锦,刘培林,何建武.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J].管理世界,2015(03):1-5.
- [4]伍晓鹰.无法摆脱的速度情结[J].品牌,2013(01):12-16.
- [5]原磊,张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J].中国金融,2024(02):77-78.
- [6]沈能,刘凤朝.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2(04):49-59.
- [7]卡罗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8]原磊.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四重逻辑[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07):12-16+58.
- [9]Reinert S Erik.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999,26(4/5):268-326.
- [10]Hsieh Chang-Tai, Peter J. Klenow.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124(4):1403-1448.
- [11]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J]. Scientific American, 1991,4:168.
- [12]Porter M E,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9(4):97-118.
- [13]Dale W. Jorgenson, Mun S. Ho, Kevin J. Stiroh. A Retrospective Look at the U.S. Productivity Growth Resurgenc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 no. 277, 2007, JEL classification: O3, O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世界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将继续以3.2%的速度增长,与2023年的增速相同;五年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为3.1%,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